

回憶與前瞻

周佛西

上海中華日報印行

正誠

第編總

政類分

全書本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5436B

誠正齋圖書

總編第...951...號

分類...政治...第...66...號

本書全部 / 冊

自從去年十二月五號離開重慶，十九號離開昆明以後，一直到現在，沒有公開的發表過言論。因為我的沈默，所以引出了許多的揣測。有人以為這是汪先生和蔣先生演的雙簧；否則，我不會離開重慶。有人以為是蔣先生派我出來，暗中監視汪先生的行動。但是無論如何揣測，據我所知道的，除掉共產黨徒及惡意者以外，我的朋友和一般公平的觀察者，對於下述兩點，意見是一致的。第一，以為我向來不是親日派，向來和日本人，沒有往來，所以這次的行動，決不是受日本人的勾引。這種觀察是對的。我雖然在日本讀了七年書，但是沒有一個日本朋友。平日只知道上講堂，進圖書館，絕對沒有和日本同學交際過。回國以後，除掉兩個朋友的太太是日本人，有時和她們見面以外，十六年之間，沒有見過一個日本人。所以像我這樣的日本留學生，實在是很希奇的。因此，說我向來和日本沒有勾搭，這次不是受日本人的勾引，完全是對的。第二，以為我這次出來，不是為的個人問題，一定另有一種見解和主張。這也是對的。我在中央，不能算是失意，不能算是沒有地位。一個毫無憑藉的窮學生，掙扎到當時的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把十幾年辛辛苦苦所獲得的政治和社會的地位，輕輕的丟掉，去尋求一種渺茫空虛，絲毫沒有把握的個人的權利和地位，世界上沒有這樣的蠢材！聽說重慶有一部份朋友，說我胆小怕死，所以逃出來。這尤其是笑話。像我這樣地位的人，老實說，無論在何處，都是有狼堅固的地下室可以躲避。

371398

本飛機，決不能輕易炸到。而且空襲的時候，已有「空襲警報」叫我們從容的準備。不像現在，時時刻刻在共產黨徒及重慶特務份子的暗算之中，又沒有「暗殺警報」叫我事前準備。所以現在所受恐怖份子的生命的威脅，比以前所受日本飛機的威脅要大得多。爲着要命、爲着怕死，反走上恐怖更多，危險更大的路，世界上也沒有這樣的蠢材！至於說到名譽，更不消說了。在共產黨徒及重慶所脅持的報紙雜誌上，當然用着漢奸，賣國，通敵的種種罪名，儘量的加以毒罵和惡咒。所以這次舉動，乃是犧牲地位，犧牲名譽，犧牲一切友誼和私情，犧牲一切歷史和成績，甚至犧牲性命的非常的舉動。爲着個人的問題，而要這樣犧牲，世界上更沒有這樣的蠢材！

既然不是爲的個人，也不是受着日本人的勾引。那末，爲甚麼要出來，爲甚麼要有這次的行動呢？這話說來很長，只好簡單的說說。不過在百忙之中，想到甚麼，就寫甚麼，不能做系統的敘述和說明。

這次的中日戰爭，真是冤枉極了。因爲是陰錯陽差的打起來，就不能不糊裏糊塗的打下去。在蘆溝橋事變初起的時候，兩國的當局，何嘗沒有就地解決的意思；何嘗不採取不擴大的方針。但是雖然都有不擴大之心，而都處於不得不擴大的勢。在日本方面，當時在華的軍人，是氣燄萬丈的。他們以爲中國仍舊是可以不戰而屈的，仍舊是可以威脅成功的。所以儘管東京方面，聲明不擴大方針，而平津方面，則儘量採取

擴大的行動。但是無論如何，就是當時的當地軍人，也沒有把當時局部衝突，演成現在這樣全面戰爭的意思。在中國方面，當時的現象，更是可以痛心。朝野上下的調子，沒有不高唱入雲的。但是調子唱得很高的人，除着頭腦極簡單的糊塗蟲以外，沒有不明白繼續打下去，中國決不能僥倖成功的道理。這些道理，共產黨、桂系及當時不滿意中央的人，沒有不知道的。蔣先生尤其比任何人要清楚。大家都知道戰爭不能擴大，不應繼續，而偏偏都高唱持久的全面戰爭。這種悲慘的矛盾，決不是將來的歷史家所能了解的。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份子，都很明白的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一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調持久的全面戰爭。蔣先生是絕頂聰敏的。這種把戲，那裏瞞得過他？所以他們的調子唱得高，他的調子唱得更高。在他的意思，以為他的調子一高，一方面可以壓服反對的人，使他們失掉了倒蔣的理由，同時對日本也表示自己的決心，使日本知道這次不是可以威脅成功，而促成日本的反省，以提早事件的解決。他的用心，實在狠苦。不過他這種用心和辦法，不僅不容易獲得他預期的結果，反足以作繭自縛，逼迫他走上他不願意走的路。我在廬山談話會的席上，聽見他發表關於蘆溝橋事件的意見以後，立即就發生這種感想。當時我就對朋友說，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適足燒身，前途是未可樂觀的。因為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着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得高，牛角就

不得不越鑽得深。同時，蔣先生本想以高調威脅日本，而日本當時在華的軍人，也不肯在蔣先生高調之下示弱。於是這邊調子越高，那邊態度越強。但是調子高是假的，態度強也是假的。無論調子如何高，態度如何強，當時都沒有從事全面長期的戰爭的決心和準備。不過一方面沒有想到高的調子雖然是假的，將來如何可以變低；別方面也沒有想到強硬的態度雖然是假的，將來如何可以化軟。於是兩方面在假的空氣之下，竟演成了真的空前的慘劇，使共產黨和俄國在傍鼓掌稱快！我想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應該互相抱頭痛哭，澈底的懺悔和覺悟！

我當時的意見，以為在北方，我們決不能再和九一八一樣的毫無抵抗。因為在北方如果不堅強的抵抗，既不能表示我國的決心和實力，就不能戡當時一部日本軍人的氣燄。我們要以實力表示我們是不可以不戰而屈，我們要以實力使日本知難而退。但是我們要堅持一種政策，就是我們是為結束戰爭而抗戰，不是為擴大戰爭而抗戰。所以我們的抗戰，只應限于北方，不應在北方以外的地方，自行挑戰。自從廬山談話會回到南京以後，就和許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適當情形之下，可以結束北方的抗戰，恢復和平的關係。當時有三種觀察：一是戰必大敗，和必大亂；二是和必大亂，戰未必大敗；三是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我研究的結果，竟得第三種看法是對的。為甚麼戰必大敗？只要是稍有常識，而不絕頂糊塗，稍為理性，而不純粹感情用事的人，沒

有不明白的，用不着多說。主張最後勝利的人，也明知道中國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組織的要素，沒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擬。但是他們總覺得國際形勢是會變化的，日本內部是會崩潰的。於是把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比天還大的問題，寄托在這兩個鏡花水月的幻想之中！他們強調只要繼續抗戰半年；俄國一定實際參戰，英美一定對日制裁，日本財政一定崩潰。這些主張，我們且暫緩以理論來反駁，只要先看看過去的事實，就可以證明其荒謬。半年，一年，一年半，到現在兩年了。國際的形勢，變化到足以使我們得到最後勝利的程度沒有？俄國參戰了沒有？英美對日制裁了沒有？日本內部崩潰了沒有？儘管國聯接二連三的決議給中國以道德的同情，個別的援助，究竟這些同情和援助，能不能使中國得到最後的勝利？對於俄國參戰的迷夢，到現在也應該醒了。去年張鼓峯事件的時候，一般人如瘋狂的歡欣鼓舞，以為日俄大戰一定爆發。我當時和一位朋友相賭，如果這次事件會擴大，可以砍去我的頭。僥倖史達林同志，和我要好，替我把頭保住。現在滿蒙邊境的衝突，一定又有許多人在那裏懷着很大的期待。假使我又以頭來相賭，我相信史達林同志，仍舊還要和我要好，仍舊會替我保持的。至於俄國若斷若續，拿來換我們的茶葉和錫鑛等物的一點點飛機大炮，那何異醫生打給氣息奄奄的病人的鹽水針。要靠這點東西，去獲得最後的勝利，豈不是痴人說夢！至於英美的對日制裁，這兩年尤其表現得明白。唯一的結果，只是美國的

政府，勸告飛機商人不要賣貨與日德意一類的國家。僅只這一點結果，能够幫忙中國打退日本嗎？現在重慶方面，對於英法蘇的同盟，美國中立法的修正，以及英法新嘉坡的會議，一定抱着很大的期待和興奮。以爲這樣一來，國際形勢一定可以變化，抗戰的勝利，一定可以達到，在那裏自言自語的自己安慰。我相信即使英法蘇同盟成功，美國中立法修正，要靠這兩事實所引起的變化，來完成中國的勝利，是絕對不可能的，何況這兩件事的本身，還是前途遼遠，難關重重呢？至於新嘉坡的會議，其性質全係守勢的那自然沒有什麼影響及中國了。總而言之，無論那個國家，各有各的利害，各有各的環境，不顧自己的環境和利害。單因爲同情而替別的國家和另一國家打仗，只有我們中國，才做這種蠢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在個人與個人之間，還不多見，怎能希望於國家與國家之間呢？或則有人以爲日本要實行東亞門羅主義，破壞門戶開放政策，所以英美爲着自己的利益，一定會和日本打仗。這話可從兩方面觀察。第一，日本是不是要在中國排除第三國的權益。我以爲日本的外交政策，決不致這樣愚笨。最近會着日本朝野人士，更證明我的觀察不錯。小的磨擦，當然難免。根本要排除英美勢力。日本現在，確實沒有這樣打算。第二，即使日本要這樣做，英美也不會因爲在華的權益和日本打仗。至多也不過經濟制裁。而經濟制裁，是否能置日本於死地，又是很大的疑問。所以想從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去尋中國的最後勝利，不是



空中樓閣是甚麼？至於日本是否崩潰，我現在不願多說，以免爲日本辯護、替日本宣傳的嫌疑。但是當時我就說過，如果戰事延長下去，日本當然是要愈益困難的。但是日本感覺着癢的時候，中國已感覺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覺着痛的時候，中國已會因痛而死了。這不是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只要冷靜的剖析一下客觀事實，就可明瞭。所以日本也許崩潰，但是中國崩潰在前。因此，想在日本崩潰之中，尋求中國的最後勝利，也何嘗不是空中樓閣？

以上所述的事實，雖然是事後回溯，也許說我是「事後有先見之明」；但是在當時確早已料到要從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日本內部的崩潰之中，去求中國的最後勝利，是斷沒有希望的。只要是稍有民族思想和愛國精神的人，誰願做敗北主義者？但是鐵一般的事實，決不容許我們的空想。因此，我斷定戰必大敗。

然而戰必大敗，和却未必大亂。當然，當時——現在仍舊如此——共產黨、桂系和其他失意無聊的份子，都以抗日爲倒蔣的工具，拿着抗日的題目，去逼迫蔣先生。但是如果蔣先生在適當的時期，毅然主張和議，政府的力量，實在足以控制全國而有餘，實在足以壓服各種反對勢力，使不致於大亂。不單是當時，就是現在，如果重慶方面，一旦覺悟，停戰議和，雖然共產黨會拚命的反對和搗亂，但是決不致使政府動搖，決不致使天下大亂。這種理論和事實，只要是稍爲明白各種情況，稍爲有點常識

的人，一定可以明瞭，此地不必多說。因此，在兩年以前，我就斷定和未必大亂。

在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堅確的認識之下，我和幾位朋友，就一面設法約人直接間接向蔣先生進言，一面設法傳佈我們的主張。汪先生的主張，是完全和我們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爲此事寫給蔣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當面也談過多次。所以我們當時就無形中以汪先生爲中心，醞釀和平運動。湊巧主張相同的幾位朋友，有些住在我家裏，有些每日必來。於是空氣漸漸傳出，漸漸的引起了外面的注意了。但是我們毫不顧忌，而且把我們這個小小的團體，叫做「低調俱樂部」。有天在富貴山地下室裏面辦公，熊天翼約我到一個秘密的房間，狼嚴重的對我說道：「你要小心，不宜亂說話。廣西方面某要人，說你是非戰集團的主要人物。我謝謝天翼的好意，對他說：『中國人只知自愛，而不知愛國。如果我們認爲於國有利的主張，爲甚麼這樣愛惜羽毛，藏在心中而不說出呢？』」

在當時，我們當然知道立即停止戰鬥行爲，不僅是不可能，而且是不應該。我們主張一面猛烈的抗戰，一面不能斷絕外交的線索。這種線索，不僅不應斷絕，而且應該漸漸的加強，以便於適當時期，接洽停戰。同時，我們主張在堅強的軍事抵抗之外，不宜從別的方面，再給日本以刺激，再授日本以口實，使他們作爲擴大戰爭的理由。不幸我們所不願意的現象，繼續不斷的發生了。中俄互不侵犯協定成立了，蔣先生

容共的談話發表了。前者給日本以刺激，後者授日本以口實，是毫無疑義的。當中俄協定公佈後的兩三天，某晚我聽見蔣先生的容共聲明，明天就要發表。我覺這兩件事，先後接着發表，實在是毫無好處。就和熊天翼商量，最好請蔣先生稍緩發表。天翼也以爲然，湊巧蔣先生那晚約他談話，他就陳述這種意見，並蒙採納。但是只延遲了三天，結果，終於發表了。於是我深刻的認識了抗日勢必聯俄，聯俄必須容共的命運。因此更痛切的感覺，內有惟恐天下不亂的共黨，外有圖收漁人之利的蘇聯，戰事一定擴大，一定延長，而使中日雙方，兩敗俱傷，而爲他們的犧牲了。

羅斯福忽然在芝加哥發表了演說。這種空砲，在我們看起來，不僅於中國沒有好處，而且還有不利的結果。因爲一方面足以增加中國無知之徒的虛驕之氣，一方面更給共產黨及高調主義者以口實；同時實際的援助，却絲毫沒有得着。所以結果，適足以擴大中日的戰爭，而使之繼續。因此，羅斯福先生的用意，雖然和斯大林同志的不同，但其結果却是一樣！但是召集九國公約國會議的消息！忽然的傳播出來了。這却給我們低調俱樂部同志以莫大的興奮。我們的根本見解，本來主張中日的關係，應由中日直接交涉來調整。九一八事變的根本錯誤，便在不直接交涉而委諸國聯。否則，事態決不致惡化到現在這個程度。所以這次事件，如果由九國會議來解決，無論日本不肯參加，就是參加，也一定得不到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但是慰情聊勝於無，也

許比京會議，能開一個和平之門，爲中日兩國，造成直接交涉的機會和環境。同時，我們以爲美國一定和日本，事前有相當的接洽和諒解，決不致冒冒失失的隨便召集。因此，我們對於這個會，抱着相當的熱情和期待。萬想不到冒失的國家不單是中國。美國並未和日本有相當的接洽，更沒有相當的諒解，也沒有想到如果日本不參加，美國的面子，怎樣過得去，會議怎樣能下台。於是比京會議，就此無疾而終了。

金山衛登陸了，前線崩潰了，中央議決撤退南京了。我於十一月十九日晚奉命離京。二十日一早，於淒風苦雨，愁雲慘霧之中，驅車到陵園，向陵墓遙拜告辭，再繞市街一週，含淚上船。所謂倉皇辭廟的悲慘情形，不圖親身經歷，也算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了。離京後一直回到長沙。父老相告，「傷兵遍地，無惡不作，將來日本軍隊還沒有來，我們恐怕在傷兵潰勇散匪的蹂躪之下，早已死無噍類了」。父老之言猶在耳，幾個月之後，真的日兵到來，而長沙已燒得精光了。

正在坐困愁城的時候，漢口忽然來了一個電報，說是和局有望，要我立即到漢口。這却使我莫明其妙了。南京危在旦夕的時候，怎樣會和？難道日本當局，真和俾斯馬克一樣，屯兵城下，來和我們講和嗎？當晚打長途電話去問，才知道是陶德曼的調解。這中間的詳情，請讀者看汪先生「舉一個例」的論文。當時便立即擁擠上幾無隙地的火車，到了漢口。但是不到幾天，調解失敗了，南京陷落了，各線都崩潰了。那

個時候的情形，現在實不忍回憶。

陶德曼第二次調解又來了。我們一般低調的同志，當然也相當的興奮，但是却沒有懷着多大的期待。後來居然失敗了。接着日本政府，就發表一月十六日的聲明。於是和平機運完全中斷了。

我們覺得世無不和之戰。英法若斷若續的打了一百年，結果還是個和。要說不和而結束的戰爭，歷史上當然也很多，最近的阿比西尼亞，就是一個例。我們當然不願學阿比西尼亞，那末，當然最後還是要講和了。即使中國能够最後勝利，至多也只能把日本軍隊，打出中國。我們要把日本當做阿比西尼亞，也是萬萬不可能的。然則結果還是要講和。「抗戰到底」。底是甚麼？底在那裏。如果不願談和，那何異說要「抗戰到亡」呢？在這個基本認識之下，我們幾個同志，雖然力薄勢微，沒有方法挽回劫運，但是我們不死心，不絕望，我們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門，不要全關；和平之線，不要全斷。這中間慘淡經營的經過，現在沒有到公開的時期，只好留待將來了。

爲着振奮人心起見，召集了代表大會和全體會議。我於是實際上便擔負起中央宣傳部的責任了。這是我頂痛苦的一件事。我是相信抗戰下去，是要滅亡的，但是宣傳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後勝利。我是主張和平之門不全關的，但是宣傳上却要鼓吹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於是我便想盡方法，向蔣先生辭職，拖了三個星期不去接事。結

果未承蔣先生允許，只好勉強担任，一天到晚的講鬼話，瞎吹牛了。這是我對不起人民的大罪惡。最痛苦的是每週的三種會議。一個是中宣部政治部和其他有關宣傳的各種機關的宣傳會議，一個是召集外國記者的談話會，一個是本國記者的談話會。出席的政治部方面是部長陳誠副部長周恩來廳長郭沫若。中宣部是我和董顯光蕭同茲。每次會議，聽着陳誠一知半解的政治理論，真使人啼笑皆非。聽着周恩來郭沫若等捏造事實，欺騙民衆的報告，真使人切齒痛心。但是以我的地位，怎好針鋒相對的明白反對。所以我當時的宣傳方針，便提出科學和理性。我要大家根據理性，運用科學，去認清事實，不可爲盲目的感情所驅使。八月底到了重慶。在重慶的一個多月，大部份的精力和時間，用在對共產黨的鬥爭。當時歐洲風雲，非常緊急。於是重慶便發生了兩派議論。一派以爲歐戰一定發生，而且於中國有利。一派以爲歐戰不會發生，如果發生於中國不利。我們是主張第二種見解的。昏天黑地的孫科及其黨徒，鼓吹第一種議論。於是孫派對於宣傳部，雖然不敢明白的攻擊，却慢慢的開始反對了。歐戰是否發生，已有過去八九個月的事實證明，不必多說。但是就是現在，也還有許多人主張歐戰於中國有利，而希望大戰發生的。所以我們不能不說幾句話。在他們的意思，以爲英美法俄一條陣線和日德義一條陣線的戰爭，最初也許後者占優勢，但是他們都是窮國，經濟力決不及前者，所以最後的勝利，必屬於前者。我們中國，就可在這個世界

戰爭中的總結算中，得到完全的勝利。像這樣持之有故，言之並不成理的論調，或可用來作無聊時的安慰，如果真正用做抗戰到底的根據，那實在太危險了。第一，假使這個推測，一點沒有錯誤，中國究竟能否支持到世界戰爭的總結算，不單是一個問題，而且可以說絕對不可能。支持到兩年，已經是意外了。以後海口全被封鎖，法幣日益跌落，武器的供給；壯丁的徵集，人心的渙散，沒有一件事，不比以前困難幾倍。歐戰甚麼時候發生，我們要等。發生之後，甚麼時候才到總結算，我們又要等。我們能支持到這樣的無窮期嗎？打算畫餅來充飢，結果，餅還沒有畫成，人早已餓死了。第二，美國是否參加，尤其是要緊的。日本是否參加，乃是決定要素。論者都是假定日美各會參加一方的。這種假定，能否成立，乃是一個絕大的問題。美國前次參加了歐洲大戰，上了一個大當，至今大部份人猶引為恨。所以孤立派的力量，實際上可以支配政治。理想主義，固然是美國的特長，但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算盤終是要打的。既然上了一次當，那裏會再上第二次？至於日本，如果仔細的研究，參加歐戰，於他們是沒有好處的。至少在戰爭發生之初，他們是不會參戰的。在日本立場，一定應在有利的形勢之下，才去參加。所以日本如果永久不參加，則歐戰的誰勝誰負，決不致影響及中日戰爭。如果日本在有利的形勢之下參加，則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日德意。所以想從世界混戰的總結算中間，去求中國的最後勝利，這個迷夢，實在可以醒了。

在重慶和共產黨徒及孫科等準共產份子，在宣傳上和理論上奮鬥了一個多月，九月底又飛到漢口了。那個時候，武漢的景象，已非常蕭索。在四面楚歌的中間，召開慶祝雙十節的民衆大會。我當主席，我竟不知道說甚麼話才好！勉強說幾分鐘違背良心的話，郭沫若忽然造個謠言，當衆報告軍令部來電話，南潯正而大捷，殲滅了八千多敵人，還有萬多正在包圍中。於是羣衆跳躍狂呼。像這樣欺騙民衆的舉動，實在令人憤慨。但是當時我能當衆說出這是捏造的嗎？低調主義者，聽着高調，已經是心煩意亂，還要跟着唱高調，我還能長久忍耐下去嗎？

天外飛來的消息；廣州失陷了。武漢的陷落，也迫在目前了。照例當這種嚴重的局面，一定要頒佈一個宣傳方針，以安定人心。但是我實在找不出甚麼理由，可以說話。要說武漢沒有軍事的價值，那末，以前爲甚麼要高唱保衛大武漢？要說敵人越深入，他們就越困難，那末，爲甚麼要抵抗，爲甚麼不就請他們深入呢？假使有個老百姓問我，鄙人忝爲宣傳部長，實在無詞以對。在無可奈何的時候，找着陳博生商量，擬了一個宣傳方針。這個方針，我自己都不能相信，那裏能使別人相信呢？

武漢是十月廿五晚失陷的，我於廿四深夜昏黑之中，飛往成都，轉回重慶。不到幾天，長沙大火的消息又來了。當時苦悶，煩惱，和焦急的心境，真非筆墨所能形容。但是一般的人心和情形怎樣？沒有一個人不想和，沒有一個人敢說和。兩個人關着



門說話，沒有不疾首痛心，咀咒戰爭，希望和平的。但是有了三個人，調子就高起來了。大家都懷着這種心理：就是和平，是千真萬真，自己所希望，所企求的；但是頂好別人主和，自己主戰。換句話說，就是大家希望別人做漢奸，自己做民族英雄。而這些民族英雄，不僅希望有所謂漢奸出來，代替他們說他們想說的話，而且從心坎中希望所謂漢奸的主張趕快實現。像這樣人人想和，人人不敢言和，人人心裏希望別人言和，表面又要反對別人言和的可悲的矛盾現象，如果任他繼續下去，一定會把國家的生存，民族的命脈，斷送得乾乾淨淨！可惜這種現象，不僅重慶，成都，昆明，內地各地是這樣；就是現在上海租界之內，大部份還是這樣。國家到了這個情形，大家還是以個人爲本位，以自己爲前提，叫人怎麼不痛心呢？

前面曾經說過，自從八一三以後，我們無形之中，就以汪先生爲中心，企圖以外交方式，結束戰爭。現在到了這種嚴重局面，我當然要去請教汪先生。當時汪先生痛惜尤多，感觸更深。對外說老實話，共產黨徒固不待說，孫科之流也加以攻擊。一般同情的人，不僅不敢明白表示，甚至假作反對。向蔣先生提出意見，始終沒有確實的結果。但是在重慶有甚麼辦法呢？所以汪先生以毅然決然的精神，決定爲國家爲民族，犧牲自己的一切，離開重慶，以便公開的發表和平主張，從事和平運動。我的主張既然和汪先生一樣，又爲汪先生的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所感動，所以也決心擺脫一切，

追隨汪先生，爲國家民族，盡我應盡的責任了。

但是我的決心，是經過了一個月以上的考慮，有時甚至澈夜不能睡眠，然後才行決定的。國家的利害問題，我早已決定，因爲我深信只有和平，才能救國。所以這一點，不必重行考慮。個人的利害，更不成問題。既要打破環境，以開風氣之先，當然要犧牲個人的地位和名譽。所以這一點，也沒有費多大的考慮。最使我遲疑不決的，乃是情誼兩個字。第一，十幾年來，承蔣先生提攜裁成，纔得有今日。過去蔣先生決沒有對我不起的地方。如果一旦脫離重慶，在我的居心，固然沒有絲毫反對他的意思，但是因爲主張不同，事實上不能不處於對立的地位。在私情上，是萬分難受的。第二，在黨部，政府，和軍隊之中，我的狼好的朋友不少。此去不單音信難通，而且後會無期。這也是足以使我留戀的一大原因。這一個月的光陰，使我經歷有生以來未曾經過的痛苦，飽嘗人世間少有的煩悶。但是經過了極端的煩悶和痛苦，我仍決定犧牲私情和友誼，脫離環境，以努力主張的實現和貫徹。

我們的和平主張，怎樣纔能貫徹？換句話說，我們的計劃和步驟究竟怎樣？這當然是讀者所亟欲知道的。不過事關秘密，現在還沒到公開的時期。現在只提出讀者的幾個疑問，一述個人的意見。

第一個疑問，便是條件問題。和平的條件，是否會使中國失去獨立，是否會使中

國不能生存？這個疑問，是每個愛國的中國人所必有而應有的。如果日本真想以外交方式及和平條約來妨礙中國的獨立與生存，那末，汪先生和我們當然也要主張抗戰到底的。因為，既然戰亡，和亦亡，當然與其和而屈服的亡，不如戰而悲壯的亡，還可以在歷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痕跡。但是不論日本居心如何，事實上他是不能滅亡中國的。既然不能，當然就要和。既然要和，當然應該提早，以免雙方多受戰爭的損失。有人或以爲抗戰越久，將來講和的條件，必於吾國越有利。如果吾們的抗戰形勢優勝，這個話是對的。像過去一樣的失城失地，恐怕抗戰越久，亡國越快，那裏還能希望有利的條件？

汪先生的豔電和近衛聲明中所述的各點，便是中日議和的根本原則。近衛聲明所述的各點，是不是亡國的條件？

不割地，不賠款，不駐兵，這能說是亡國的條件嗎？我們試把近衛聲明所提出的各點和二十六年十一月德大使陶德曼調解時所提出的各點（參看汪先生「舉一個例」一文）對照比較一下。除着近衛聲明中多一個日本人民在中國內地希望有居住及營業之自由，而日本可以放棄領事裁判權，甚至考慮交還租界以外，其餘各點，都是一樣。對於陶德曼所提出的各點，最高軍事幹部會議，既認爲不是亡國條件，（參看前舉一文）何以對於近衛聲明中所述各點，却說是足以使中國滅亡？我們再想一想時期。

陶德曼的調解，是在南京沒有陷落之前。近衛聲明，是在丟了南京，失了廣州，放棄了武漢，燒光了長沙以後。打仗打敗到這個程度，而議和的條件，比以前却沒有很大的苛刻，爲甚麼當日可以接受和解，現在却反對進行交涉？日本人民在中國內地雜居，自然是陶德曼調解時所曾未提出的，能够打銷，當然希望打銷。但是日本如果放棄了領事裁判權；並且交還租界，那末內地雜居，也不會使中國滅亡。因爲日本既然放棄了領事裁判權，所有在華的日本人民，都要服從遵守中國的法律，我們可以國內法來管理他們，怎樣會使我們亡國？

根據上述，可見議和條件，決不是亡國的。如果我們有最後勝利的充分把握，那當然是另外一個問題。否則，抗戰到現在這樣的情形，還能够得到這樣的條件，平心靜氣，也可以滿足。我們主和的人，良心上也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了。

第二個疑問，便是沒有保障。有許多人以爲日本沒有信義，如果直接交涉，一定會上當。因此，主張第三國居間調解，最好能在國際會議之中，解決中日糾紛，纔能够得到保障。

這種顧慮和主張，都是對的，能够這樣，誰不願意。但是中日直接交涉，乃是一八以後日本的傳統政策。這個政策要他何取消，是不可能的。既然日本堅決主張直接交涉，我們是否僅僅因爲交涉方式的問題，情願犧牲比較輕鬆的條件，情願抗戰到

亡呢？我們只要是忠誠的謀國，當然情願得到較好的條件，而不願拘泥於交涉的形式。

再進一步看，有沒有保障，全在我們自己如何的做法。我們自己有辦法，就有保障。如果自己毫無辦法，甚麼保障都是靠不住的。歐戰以後，英法對於德國的議和條件，是有充分的保障的。英法左手拿着凡爾賽條約，右手拿着國際聯盟，德國還不能規規矩矩的履行條約嗎？但是凡爾賽條約撕破了，保障在那裏？即就中國而論，九國公約，是保證中國的神聖條約。但是除掉在法理上主張不承認主義以外，在事實上給中國以甚麼實際的保障？現在希望國際調解的，當然是希望英美法出面。他們都是九國公約簽字國，他們既然不能根據九國公約來保障，另開一種會議，新訂一種條約，就可以保障嗎？所以問題只在我們如何做，國際保障，也是靠不住的。

然則一點保障都沒有嗎？當然是有的。近衛聲明中的各點，是經過他們五相會議，內閣會議通過，再經御前會議，而公開發表於世界的。他們御前會議所決定的政策，是不容易變更的，此其一。他們既然昭告世界，向中國所要求的條件，在全世界的注視之下，我相信日本決不致這樣不講信義，將來再提出苛刻的條件，此其二。有了這兩重保障，我相信將來開始正式談判的時候，日本決不致於近衛聲明各點之外，再提出其他的要求。如果日本真正這樣不顧信義，那裏還能立國於世界。

第三。是日本的誠意問題。假定正式的和平條約，完全根據近衛聲明和豔電而成立，日本是不是誠心誠意的來履行呢？這也是每個愛國的中國人所必有而應有的顧慮。

我從各方探聽關於和平的意見，大約十分之九是贊成和平，而十分之九是懷疑日本的誠意的。他們的懷疑，是好意的。共產黨徒，因為要反對和平，所以惡意的宣傳日本沒有信義。一般人因為希望和平，所以恐怕日本沒有誠意。這種懷疑，足以供我們主和同志的參考，同時也可以促日本人士的反省。我常常聽見說，日本的話，說得狠好聽，日本的聲明也說得極漂亮，但是實際上所做的事，完全不是這樣。口口聲聲所說的平等互惠的經濟合作，事實上完全表現為壟斷。英美的經濟侵略，還替中國留下一點生機，像最近一年來，所表現的中日經濟合作，比幾十年來的英美經濟侵略，要厲害得多，幾乎不僅把肉吃光，連毛帶骨都要吃得乾乾淨淨，使中國沒有生存的餘地。我又常常聽見說日本內部的意見紛歧，派別複雜。東京所約定的事情，常遭當地軍人的反對；上級當局同意的事，下級機關可以不奉行。甚致在同一城中，城北甲機關所發的通行證，不為城南的乙機關所承認。這種情形，使平日對於日本有好感的人，也漸漸覺得毫無辦法，漸漸覺得憂慮和疑懼。這些感觸，都是根據事實，決不是憑空發生的。所以，不僅中國主和的同志，應該充分的注意，就是日本人士，也應該虛

心坦懷的去檢閱。

這種疑懼的心理，和不合理的事實，我們當然盡量的告訴了日本朋友。我們表示如果這種疑懼的心理不消除，中日的真正親善，是沒有希望的。而消除這種疑懼，必須首先糾正種種不合理的事實。單憑聲明，是絕對不夠的。十餘次愛護中國人民的聲明，他的効力會被城門口的日本士兵給中國人的一個耳光所抵銷。一百回尊重中國內政獨立的聲明，他的影響遠不及宣撫班長給縣長的一頓臭罵。諸如此類的事實，如果不切實糾正，不僅一般人民不易消除反日的情緒，就是我們，也要回到重慶去抗戰。所以日本有無誠意，自然要看今後事實的表現，才能正確的判斷。

不過，據我個人幾個月來所接觸，所體驗，我深信日本現在的當局和有識的人士，是有誠意的。他們也痛恨日本奸商在中國的種種掠奪。他們也憎慨日本浪人在中國的不法行爲。他們也嘆息少數無智識的兵士的橫暴。他們也深感機關的複雜和事權的不統一。但是他們決心把這些過渡時期的必有現象，逐漸改良，而納入正軌。據說這半年來的情形，確較半年以前好得多。我以為只要日本當局和有識人士有着誠意，就可說日本有誠意。如果要日本全部人民，立即都沒有侵華侮華的思想和行動，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幾十年來，教育和政治的影響，決不能於短時期內完全改變。如果因為這種原因，便懷疑日本沒有誠意，那是不對的。反過來說，汪先生及我們一般同志，

當然是誠心誠意的主張。日本提攜及合作的。但是我們能保證中國全國的人民，目前都沒有反日抗日的情緒和行動嗎？如果日本因為中國還有人反日抗日，便懷疑汪先生和我們沒有誠意，那不是天大的冤枉？所以我們不能因為一部分的事實，便根本以為日本沒有誠意。

我常常對日本朋友說，中日兩國的國交調整，今後不是對外的問題，乃是對內的問題。就是日本對內如何管理其國民，使沒有侵華侮華的行爲，如何教育其國民使沒有侵華侮華的思想。中國則在對內如何管理其國民，使沒有反日抗日的行爲，如何教育其國民，使沒有反日抗日的思想。如果兩方面對內的政策和教育，都能成功，則兩國的真正親善就可實現，永久和平就可樹立。過去兩國都是責人而不責己。中國說日本侵略，日本說中國反日。彼此互責，彼此互疑。今後我們都要改變態度。我們都要自責，而不責人，都要互信，而不互疑。這個道理，日本有識之士，是充分了解的。不過兩國對內，都有許多難關和許多癥結。我們應該分別努力去突破這些難關，去消除這些癥結！

我個人深信日本當局和有識之士，現在確實是有誠意的。不過要使中國一般人相信起見，我很希望日本方面進一步以事實來證明。

根據上面所述，我們可知：第一，和平條件不是亡國條件；第二，條件的成立和



履行，有相當的保障；第三，日本當局和有識之士，是有誠意的。在這三種情形之下，我們爲什麼不立即和平？爲什麼要抗戰到亡？爲什麼要學阿比西尼亞？同胞們！不要爲共產黨所劫持，不要爲重慶所威脅，不要爲一部淺薄無知的輿論所蒙蔽，我們要一致奮起，參加和平運動，促成和平實現，以保障國家的生存和民族的獨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54368

書

號

號

冊